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0 年第 14、15 期合刊 · 总第 758、759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内容

疫情考验下的欧盟数字战略

柏林大游行的民粹背景：选择党火中取栗能否心想事成

德国经济开始回暖，真正恢复尚需时日

“中国可以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 年 7 月 11 日~8 月 10 日）

疫情考验下的欧盟数字战略

2020年7月21日，欧盟峰会经过艰苦谈判终于为疫后经济复苏铺平了道路，而数字转型成为冯德莱恩所称“欧盟下一代复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对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视其实由来已久。早在2010年出台的欧盟十年发展规划《欧盟2020》中，“欧洲数字议程”就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七项举措之一。之后欧盟又相继发布《数字单一市场战略》（2015年），《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6年），《人工智能战略》（2018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推动欧洲数字经济的发展。

基于前疫情时代的欧盟数字战略

2020年2月19日，欧盟委员会接连发布了《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欧洲数据战略》和《人工智能白皮书》三份文件，形成了其最新的数字转型战略。其中，《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提出了“科技为人服务”“保障公平和有竞争力的经济”和“建设开放、民主和可持续的社会”三大目标，实现具有全球竞争力、基于价值观和包容性的数字经济和社会，从而把欧洲打造为一个值得信赖的数字经济领跑者；《欧洲数据战略》以打造数据增强型社会为目标，在欧洲建立单一数据市场，促进数据的充分利用和自由流动；《人工智能白皮书》提出了一个基于卓越和信任的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框架，并提出要对高风险和低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区别对待。该战略涵盖了从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数字教育和技能到民主和媒体等各个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希望这个数字战略能够反映出欧洲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开放、公平、多样性、民主和信任。”

欧盟数字战略本身并无疫情背景，其酝酿早于新冠疫情的爆发。欧洲虽然1月即已出现确诊病例，但直到战略发布之日的2月19日，欧洲仍处于疫情爆发的前夜，各国对疫情还没有给与足够的关注和警惕。欧盟推出这一数字战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身内部的发展问题和应对来自外部的严峻挑战。

首先，欧盟数字经济发展整体滞后、区域发展不平衡。欧洲数据基础设施落后、数据可用性不足。2018年欧洲IT业数字经济占GDP比例约为1.7%，大大低于美国的3.3%和中国的2.1%。从互联网企业看，全球30大互联网公司欧洲仅占1家，欧洲本土企业处于弱势，欧洲市场被境外“数字寡头”把控。同时欧洲的数字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市场碎片化，跨境壁垒多，版权法规、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均不统一。这些都成为欧洲数字经济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欧盟迫切需要整合各成员国力量，强化数字单一市场，建立“单一欧洲数据空间”。

而在应当如何发展数字经济的问题上，欧盟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欧洲在这一领域已经落后于美国、中国等世界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中，但欧洲无论对美国的发展模式，还是对中国的发展模式，都并不认同。这一理念上的差异尤其体现在对数据的管理上：欧洲人认为，美国的数据主要在私人手中，过于自由，而中国的数据则主要在国家掌控之下，监管过度，欧洲希望能找到美国和中国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在监管和自由竞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兼顾自由、安全与福祉。

最后，欧洲与美国之间分歧越来越大，也迫使欧洲走上独立自主之路。尤其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优先”主导了美国对外政策，欧盟被视为美国的一大竞争对手。无论是美国对德国“北溪2”输气管道建设的无情打压，还是汽车、钢、铝等产品的高额关税，都令欧盟各国深感不安。而具体到数字经济领域，欧洲市场早已呈现美国互联网企业独大的局面，为了其遏制垄断势头，法国等欧洲诸国出台数字税，而这一举措又引

发了美国激烈反应。在这个地缘政治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更加注重自身狭隘利益的美国以新的方式暴露了欧盟缺乏独立性的问题——尤其是在数字领域。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和风险，欧洲迫切希望能够确立和维护自身的“数字主权”，提升自身在数字经济上的竞争力，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使欧洲成长为能与美中两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相抗衡的第三极。

疫情对欧盟数字化的考验

巧合，也可以说不巧的是，欧洲数字战略推出的时间点，正与新冠疫情在欧洲爆发的时间几乎重合。2月21日，意大利北部的疫情突然开始快速扩散，并迅速在欧洲蔓延，尤其是中西欧一度成为全球疫情的风暴中心。为了遏制疫情，尽管欧盟内部的措施各不相同，但各国普遍采用了诸如建筑信息和联系人追踪移动应用程序、公共服务数字化和远程工作等解决方案，并积极推动跨国界信息共享、合作抗疫。欧盟也重视以数字化手段应对疫情，于4月启动了旨在收集和共享研究数据的“欧洲新冠肺炎数据平台”，作为“欧洲开放科学云”的项目之一。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也于4月对疫情背景下收集和使用的个人数据表示了支持。民众的工作、学习与生活，以及大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都转移到线上，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技术则帮助各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数字化在应对危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但随着数字化在社会经济生活和危机应对中的重要性得到凸显，欧洲数字经济发展中一直存在的问题也同时放大。欧洲正在为其数字化的落后付出高昂的代价。

-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疫情期间的要求。欧盟各国的信息通信设施普遍老旧，而光纤网络和5G网络建设成本高企，进展缓慢。在全民居家的情况下，线上工作、学习、娱乐的猛增令网络不堪重负。为了保证网速不至于影响到其他重要需求，Youtube与Netflix等在线娱乐供应商不得不在欧洲地区调低视频清晰度，通过限流来缓解网络过载问题。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还体现在所谓“数字鸿沟”上，这种鸿沟不仅体现在国家与国家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上，更体现在国家内部的城乡之间。疫情凸显了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对国家保持行动能力、特别是在危机中保持行动能力的重要性，数字鸿沟则会对欧洲的应变能力造成威胁。
- 高标准数据监管影响了疫情防控的成效。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都做了严格规定，使用数字手段来进行疫情防控，在欧洲的难度要大大高于亚洲。当中国和亚洲各国纷纷开始使用大数据、算法、人脸识别等技术进行疫情的追踪防控时，欧洲还在观望和讨论，从2月下旬疫情爆发，直到3月底各国才开始陆续启用数字手段，如德国6月终于推出疫情追踪App，自愿安装，在用户自主开启蓝牙的情况下通过交换匿名ID来找出和通知密切接触者，数据不进行中央存储而是分散化处理。可以看到其中第一位的仍是高标准的隐私保护，而非疫情防控的效果。
- 欧盟各国的数字化政策仍然缺乏协调，数字经济发展呈现碎片化。欧盟各成员国数字化发展程度相去甚远，各国在数据使用和监管方面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各国在科技问题上缺乏共同立场，缺乏共同认识，欧盟层面虽然进行大量的协调工作，仍难以推出统一的数字化疫情防控手段。而疫情防控数据的共享也仍然不够顺畅，虽然欧盟推出了研究数据的共享平台，但各国和各研究机构之间

仍然缺乏协调，一些企业拒绝共享数据。很多数据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从而影响到整体的疫情防控和疫苗药物的开发。

- 对外部服务依赖严重。使用数字化手段进行疫情防控，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大量敏感的个人数据的处理，一些欧盟国家直接选择由总部位于欧盟以外的全球技术行为者设计的数字解决方案，数据存储在国外，欧盟高标准的数据保护难以保障。此外，如前文提到的德国的解决方案虽然是自主研发、分散处理，但事实上此类方案均离不开移动设备，而欧洲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移动设备均采用安卓或苹果系统，德国这款 App 从开发到应用都严重受制和依赖于这两大系统。危机凸显了欧洲在数字市场和数字技术上的对外依赖性，而美国在抗疫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美国第一”、不顾盟友的自私行为，更使欧盟倍受打击。
- 民众的数字素养和对新的数字技术的开放度尚待提高。一方面，疫情导致大量工作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很多劳动者的工作环境由物理环境转变为数字环境，如何使劳动者迅速适应这一转变变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对于欧盟高标准的数据保护，很多民众仍然觉得不够。仍以 6 月推出的德国疫情追踪 App 为例。专家评估这款 App 需要 60% 以上的民众积极使用才能起到防控效果，德国电视一台民调却显示，愿意安装此类 App 的民众仅占 42%，反对者高达 39%，且其中半数仍是出于隐私保护的原因。在完全自愿安装使用的前提下，这样的防控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欧洲推出数字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疫情中得到充分证明。而经过几个月后再回头看欧盟数字战略，不得不说这一战略还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回应了危机应对向数字化转型提出的要求，也对其中暴露出来的大部分问题做出了针对性的回答。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多方面的挑战，该战略三大目标下所列的优先行动基本足以应对：在“科技为人服务”中的优先行动包括如推进欧洲千兆网络建设、欧洲网络安全战略和旨在提高公民数字素养和能力教育的数字教育行动计划；在“保障公平和有竞争力的经济”目标中的优先行动包括旨在使欧洲成为数字经济全球领导者的欧洲数据战略；在“建设开放、民主和可持续的社会”目标中的优先行动包括建设欧洲数据内部市场以及建设欧洲健康数据空间，方便民众与研究机构安全地交换、访问和利用健康数据。而在国际层面，战略更是提出要“在新一代技术的采用和标准化方面取得领先”，要在国际舞台上推进欧洲的方案和利益。这也正是欧洲捍卫数字主权的关键之一。

中美博弈中的欧洲数字主权之思

如上所述，疫情揭示了技术对于经济复苏和健康保障的关键重要性，使欧洲的数字转型和数字主权凸显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疫情从爆发到如今已经逾半年，全球的防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不容乐观。欧洲近期呈现第二波疫情卷土重来的迹象，而美国似乎第一波疫情都还没有过去。新冠大流行改变了国际局势，中美关系尤其在技术问题上正在持续恶化，世界渐渐走进一个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新时代。欧盟发展数字经济、争取数字主权的环境由此改变。

从近期欧洲关于 5G 和互联网监管等问题上的各种政治争论中，可以看到欧洲受中美冲突影响之深。从社交平台到基础设施，欧洲在数字经济的各个领域依然高度依赖美国和中国。中美之间的竞争，意味着欧洲市场日益成为双方建立其全球技术和工业主导地位的更大斗争中的一个关键战场，也为欧洲的数字转型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最近欧洲的一些专家从中美两国在技术问题上不断深化的竞争中看到了机会。他们认为，中美数字治理理念和方式上的鲜明差异为欧洲开辟了广阔的中间地带，使得欧洲有机会成为两种治理之间的调停者，以及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欧盟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工具是其法规，希望通过对欧盟数字市场上的监管行为，将其影响辐射到全球，从而参与数字治理的塑造。《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种局势也成为欧洲发展自身数字能力的一大推动力。欧洲在数字领域对美国的依赖远远超过对中国的依赖，而美国却正在表现得越来越自私自利，不断滥用其在欧洲的数字主导地位，有欧洲专家称美国互联网公司正走向“新殖民主义”。欧洲近期的种种努力，例如征收数字税、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反竞争行为进行罚款、考虑制定新的产业政策以培养欧洲在关键领域的冠军等，都体现了欧洲反抗的意愿。欧洲也不会满足于仅仅发挥监管能力，在中美竞争中充当裁判甚或是战场，而是要争取成为足以与中美抗衡的力量。欧洲提出数字主权，就意味着数字经济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欧洲人在这方面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

中国在欧洲：困难中仍有机遇

近几年来，欧洲视中国为数字领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竞争者而日益警惕，即使中国目前在欧洲数字经济中的存在远远不及美国。而疫情期间欧洲对中国的看法更多地面向负面发展。有欧洲专家曾说，从数字主权的角度来看，如果说美国是欧洲最大的问题，那么中国就是欧洲最深的恐惧。欧洲人看到，中国对欧洲市场的兴趣越来越大，并且一直坚持向价值链上游发展。中国现在几乎在每一个高科技领域都在挑战欧洲（和美国）公司。因此，无论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还是欧洲自身发展未来技术、巩固数据主权的需要，抑或是欧洲出于其对自身价值观的焦虑，接下来欧洲一定会以更激烈的竞争甚至严厉的防范打压来应对中国，中国面对的是一种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交织的复杂挑战。

但事实上，中欧之间技术和经济合作一直相当密切，合作仍然是主流，而欧洲确立数字主权也不意味着闭关自守。正如几天前华为在德国媒体刊文所说，在全球化的世界和国际化的供应链之下，自给自足不可能实现数字主权。相互交织的国际供应链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能将本国或其他国家排除在高科技产品创造增值的过程之外。例如作为欧盟数字化建设的重要项目之一的“Gaia-X”的受信任云平台，就始终有外部科技巨头参与，华为也很有可能参与其中。同时，疫情使得欧洲各国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复苏之路坎坷，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欧盟疫后经济复苏计划的重点之一。而由于整体经济形势不佳，价廉物美的中国供应商其实也仍是上佳选择。

今年2月我国王毅外长访德时提出了2020年中欧关系六项优先事项，“开展数字领域合作”既是其中之一。6月的第二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欧方也提出要加强互联互通，深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今年以来的多次中欧会晤和接触中，数字经济被列入中欧合作的优先事项。刚刚过去的第八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主题为“开启后疫情时代中欧合作新局面，引领全球经济稳健复苏增长”的会谈中，数字经济也成为重要议题。期待在新冠疫情、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特殊背景下，中欧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仍能负重前行。

柏林大游行的民粹背景：选择党火中取栗能否心想事成

8月1日，两万人走上柏林街头抗议德国政府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因为实际参与人数大大超出申报人数，且全体示威参与者均不戴口罩聚集，故意违反防疫要求，警方试图用高音喇叭驱散无果后，调集约千名警力强行疏散并带走多名组织者，期间引发冲突，导致十几名警察受伤。同时几家主流媒体派出的新闻采访团队也遭到了抵制和攻击。目前德国正面临第二波疫情的来袭，日新增患者已经超过千人，鉴于德国一些州的学校暑假即将结束，州政府、联邦政府和病毒学家都紧急发出警告。大示威也再一次引发了关于收紧规则的讨论。

这次参与者组成极为混杂。现场挥舞的旗帜有德国国旗、代表同性恋的彩虹旗，还有为右翼极端分子常用的德意志帝国黑白红三色旗，Pegida（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旗帜，以及以左翼分子和环保主义者为代表的斯图加特 21 工程抗议活动的标志。还有一些神秘主义者和反对疫苗接种者。平时很难想象这些人会走到一起参加同一个示威活动。可以说，示威者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拒绝佩戴口罩，指责强制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疫情防控措施侵犯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

那么，这些人是能如何走到一起的呢？事实上，这一类的游行和集会在德国并非首次。新冠疫情 2 月底在德国爆发后，抗议活动自 2020 年 3 月底起在德国一些城市陆续重现，一些联邦州或城市为疫情防控需要开始立法对抗议示威活动做出限制。2020 年 4 月 15 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不得对 2 人以上的抗议示威集会进行全面禁止，但需要参与者遵守防疫规定。针对疫情防控措施的抗议活动 3 月底从柏林开始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蔓延到全德国汉诺威、慕尼黑、纽伦堡、斯图加特、海德堡等多地。

此类集会成员复杂，宗旨与口号均不尽一致，但基本以反对限制、要求自由为主要呼声，并充斥着关于新冠疫情的各种虚假信息和阴谋论，诸如“统治阶级”正在利用一种病毒“在整个部分人口中传播恐惧和恐慌”，“高科技独裁，全面监视和控制”和“在皮肤下植入微芯片”等，或淡化新冠病毒传播风险，从而质疑防控措施。领导者往往是民粹主义组织和民粹主义分子，德国选择党也在其中相当活跃。组织者不仅传播虚假信息，还热衷于制造虚假信息为己所用。如 8 月 1 日柏林的活动，据组织者自称参与者达 130 万之众，而非警方所称的 2 万。事实核查机构鉴定 130 万为虚假数字，且揭露了组织者使用往年柏林爱之大游行图片作假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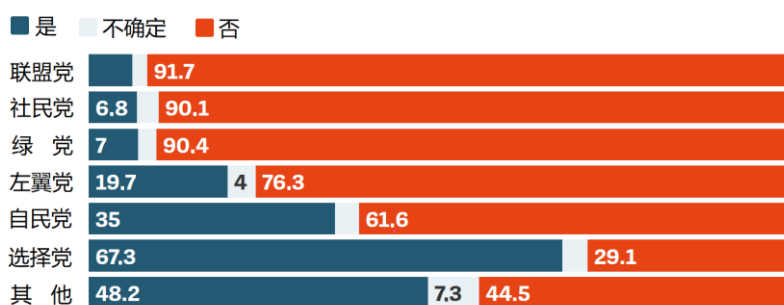
在观察者眼里，柏林的这次集会是民粹主义者的又一次成功。集会上民粹主义宣传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演讲中不是真正讨论新冠危机和疫情防控所带来的实际问题，如自由职业者、学生和家庭面临的困难等，而是使用富有煽动性的词汇，所指控的包括“法律条条框框太多”“违反基本法”“侵犯自由”或“外国势力控制”等，现场电音震耳，气氛热烈。这种策略成功地吸引了大量不同政治倾向的民众。被吸引来参加集会的人中，有很多其实并非倾向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只是因为疫情带来的受挫感，希望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而正是这种往往被社会主流所忽略的情绪，让民粹主义者得以乘虚而入，并获得了一种令人不无忧虑的成功：现场有人挥舞第三帝国战旗，路人指责示威者与纳粹同行，但示威者的回答却是：“应当尊重言论自由”。基民盟领导人 Markus Söder 指出，在示威活动中，“世界阴谋论者与极右派，也与左派一起游行：有一些东西走到一起，其实根本不属于一起”。《明镜在线》评论员则观察到“民粹主义者如何发现并挖掘新 Pegida 运动的潜力。”

所幸此类示威迄今在德国未能引起广泛的共鸣。据民意调查机构 Civey 于 8 月 1 日

-3 日为《明镜周刊》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 5000 多名被访者中，对于示威者及其对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批评和对“自由”的呼吁，大多数人表示不了解，有 12% 的人表示鲜明反对，但也有 10% 的人对此种示威活动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从被访者年龄来看，支持示威活动中的人中，以 30-49 岁的中年人稍多一些，但不同年龄段的意见差异不算明显。但是如果把被访者按其对政党的偏好分类，如下图，则呈现出明显的阵营。联盟党、社民党和绿党的支持者绝大多数反对示威行为，左翼党和自民党的选民也多数反对，而选择党支持者的态度则截然相反。

对于反对国家疫情防控措施的示威，您是否持理解态度？

各主要政党支持者的态度，单位：%



来源：明镜在线

德国大多数政党均对示威参与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为此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继续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少数人的不负责任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风险！现在掉以轻心，就会危及很多人的健康，也影响到我们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复苏。”而选择党主席 Tino Chrupalla 在媒体上直接宣称示威者无罪：“我看不到任何不当行为。”他认为示威一直是和平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基本权利和公民权利而走上街头“是一件好事”。图林根州选择党主席 Björn Höcke 也赞扬了示威者，称赞他们是在为自由而战，因为德国已经“濒临灭绝”，他鼓动“人民”团结起来阻止这一切。

专家认为，选择党之所以为此类抗议活动推波助澜，摇旗呐喊，是通过揭露所谓不正确言论，把自己树立为疫情防控措施尖锐批判者，以反建制政党的形象来吸引民众注意力。在这方面选择党可谓是成功了，民调显示，有半数的被访者认为游行示威的参与者具有选择党背景。但这个策略其实并不明智，选择党在民众中的形象并未随着抗议示威的推动而得到改善，目前该党支持率仅为约 8%，大大低于上一次联邦议院选举中的 12.6%。而疫情爆发以来该党的所作所为引发普遍反感，当是选民流失的重要原因。随着第二波疫情在各地纷纷爆发，选择党想要继续以这种方式博取人心，无异于火中取栗。

德国经济开始回暖，真正恢复尚需时日

2020年经济面临深度衰退已成定局。联邦统计局新的危机监测报告显示，德国经济因新冠疫情造成的崩溃比2008年和2009年经济金融危机期间更为严重。德国经济在疫情最高峰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低迷。从联邦统计局的数据看，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以及私人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都大幅下滑。去除季节性因素，2020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季度下降10.1%。据德国工商会协会估计，疫情影响下2020年出口也将萎缩15%。欧盟委员会对2020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是下降6.3%，也较2009年经济金融危机时的5.7%更为严重，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下滑。

经济低迷影响到就业，2020年第二季度就业人数与去年相比也有1.4%的大幅下滑，大大高于2009年经济金融危机时期的0.3%。新冠疫情导致失业率上升，而工作岗位却急剧减少。据纽伦堡就业研究所(IAB)的数据，第二季度的工作岗位空缺数量仅为89.3万个，比2019年减少了36%(50万个)，其中以工业部门的情况最为严重，而公共行政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空缺岗位数量则略有增长。工作岗位急剧减少的一大原因是短期工作的增长，5月份从事短期工作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70万。目前失业者求职遭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每三位失业者才有一个空缺岗位，而在2019年春季，失业人数与空缺岗位数之比为1.6。

但随着疫情防控初见成效，5月以来限制开始放宽，社会经济的各方面数据又纷纷出现积极信号。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字，2020年6月份德国出口商品价值961亿欧元，进口商品价值805亿欧元，出口额比上月增长14.9%。但与去年相比，今年6月的出口额下降9.4%，进口额下降10%。相应地，外贸顺差也略有回落：排除季节性影响后2020年6月外贸收支顺差为145亿欧元，低于去年同期的165亿欧元。总的看来，德国出口企业的形势正在持续改善。最困难的是4月，当时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各国临时采取防控措施关闭边境，造成物流和供应链中断，对进出口造成巨大损失和深远影响。5月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丝回暖的希望。5月份出口额与去年同期相比降幅仍接近30%，但与4月相比却已有9%的增长。

企业界也出现了积极的信号。据统计局统计，6月份企业生产量比上月增加11.1%。工业、建筑业和能源公用事业合计的总生产量攀升了8.9%，略强于专家预期的8.1%。7月Ifo商业环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升，从6月的86.3点攀升至90.5点。工业的新订单6月份已经有27.9%的增长。

消费者信心在经历了低迷之后也在逐渐恢复。根据德国零售协会(HDE)8月3日公布的消费者晴雨表，当前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6.3点，7月甚至高达98.1点。增值税降低的措施在其中发挥了刺激消费的积极作用。

根据德国联邦银行的估计，联邦政府提供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为当前的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德国政府推出了针对2020年和2021年的总额为13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增值税从2020年7月1日起连续6个月下调：分别由19%降至16%和7%降至5%，以冀促进消费。工商业希望这一措施可以延长至一年，但必须承认的是，这样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尽可能把问题推后。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的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种种迹象“明显指向复苏”，德国已走出了4月份的低谷。只要感染人数不再大幅上升，下半年经济将有所回升。不过，由于之前的崩盘程度较深，德国在短期内无法弥补所遭受的损失，下半年很难恢复正常产能，要想完全回到疫情以前的状况，可能需要两年时间。同时，由于德国是出口导向

型经济，而目前德国所有主要出口市场的需求都很疲软。因此德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也还是要看全球的情况。

而正如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言，当前德国疫情再度呈现一种令人忧虑的状况。几周来新增感染人数明显高于六月，而恢复度假、学校开学以及密集无防护的抗议示威，都使这方面的风险大大增加。而对于可能到来的再次收紧疫情防控措施，德国民众的支持率还是相当高的，超过 82%的人对此表示支持，其中的大多数甚至支持比春季更严格的防控。在这样的民意支持下，一旦疫情再度大规模爆发，严格的措施会更容易执行到位，经济就将再次带来重创，但也只有严格的措施才能使社会经济生活尽快恢复正常，经济才有慢慢走出低谷的可能。

“中国可以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8月9日，德国《每日镜报》刊载了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执行主席、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所所长福尔克尔·佩尔特斯（Volker Perthes）的访谈，题为《中国可以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这里将其中关于中欧及中美关系的部分编译如下：

问：我们是否应该害怕中国及其扩张？

答：一方面不能把中国妖魔化；另一方面，不能因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北京对实力的追求。我非常赞成与中国进行密切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接触。但是，在向中国销售汽车或出口其他商品获得利益的同时，不能遗忘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超级大国，它正在有计划地努力成为世界第一。这个庞大的国家在国家组织结构上的观念与我们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差异欧洲早已认识到并不得面对。而在应对中国的挑战上，欧洲比美国有一些优势。例如，我们不像美国，要和中国争夺世界第一的地位。而且我们与中国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所以，我们可以更容易、更冷静地面对中国及其影响。

问：中国的领导层到底能不能信任？

答：今天很多人都在问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总统换届可以导致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那么美国的领导层还能信任吗？美国参议员威胁说，如果德国公司支持德国和欧盟批准的北溪 2 项目，为之提供服务，他就要伤害德国公司的利益，这还能说是可靠的合作伙伴吗？难道中国不可能比大西洋彼岸的盟友更可靠吗？

问：从这个角度看，甚至连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都比美国“更稳定”？

答：普京的制度和中国的制度不同，它更加个人化，而没有中国这样在精英群体领导之下的广泛夯实的政党制度。俄罗斯当然不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但在普京的领导下，它在某些方面有点类似特朗普政府：一个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伙伴的国家。

问：中国能否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

答：我想是的——如果我们不要期望值过高。与中国达成协议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一旦达成协议，我们应该能够使北京履行协议。毕竟，“守约”原则也符合中国利益。在这种国际上的“法治”形式上我们可以和北京达成共识。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对我们内部秩序重要的东西强加到我们对世界秩序正常运作的想法上。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国际伙伴都认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我不是喜欢威权主义，但是就争取民主、自由和法治来说，我们欧洲人自己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们应当先在自己的国家共同体

——欧盟内部为之努力。

问：中国是否已经取代了美国世界强国的地位？

答：没有。北京的目标是成为第一，这可能会成功，但也不一定。几十年前，人们曾预计日本会超过美国，取而代之，但到今天又如何？中国如今是一个世界强国，但还远不是第一。如果论实力推算，美国目前仍遥遥领先。中国人没有遍布世界各大洋的舰队。而美国还有一个覆盖全球的盟友网络，即使目前这个网络缺乏维护。

问：中美之争已经是冷战了吗？我们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答：目前不是，但如果情况恶化，也有发展成冷战的可能。即使对于欧盟、尤其是德国这样不想参与这场冲突的行为体，这也是一个真正的风险。我们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我们与美国的经济利益大于与中国的经济利益，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和美国共享价值观。然而，如果我们必须在与美国或与中国的生产性、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做出选择，这样的世界秩序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毫无疑问，中美之争目前正决定着世界政治，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仍是如此。对地区冲突的处理、经济合作和技术竞争越来越从属于这一争端。对欧洲，也对大多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面，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国际卫生政策或联合国对和平与解决冲突的承诺等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卷入中美之争。

问：欧洲能贡献什么？

答：欧洲能做的事很多。欧洲本身必须更加自主地确定自己的利益和优先事项，为之找到必要的资源，并与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欧洲必须自力更生。欧洲常常习惯于等待美国为我们维持“世界秩序”，而当其他国家，比如俄罗斯，占据了美国留下的空白时，我们又只会抱怨。事实上，这通常会造成更多的混乱。中国根本不宣称自己关心国际秩序，而是更喜欢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将其他国家与自己联系在一起。既然我们常说中东的稳定符合欧洲的利益，那么就必须对其进行大量投资。我们需要一项全面的欧洲政策，不仅要使我们能够避免风险，而且还要将稳定投射到中东等邻近地区。

特朗普给欧洲敲响了警钟。他已经向我们表明，战略自主是我们欧洲人的需要。而这一定会让我们付出一些代价。欧洲人必须就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达成一致。这并不意味着终止与美国的合作关系，而是让这种关系更加对称。那么这样一来，几千名士兵是否撤到某地的问题也就不重要了。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年7月11日~8月10日）

7月8日 德国央行以票面利率为零发行5年期国债。德国财长肖尔茨表示，低利率有助于我们为债务融资。预计德国将在2021年至2022年恢复到新冠危机前的经济水平。

7月9日 德国财政部宣布，在2010年至2019年这10年的时间里，共为驻德美军花费了9.824亿欧元，其中有6.45亿欧元花费在建设方面。

7月11日 德国经济部部长阿尔特迈尔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采访中指出，德国不会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并非每个国家都在按照西方的模式运作。德国不会中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7月16日 针对美国日前威胁对参与“北溪-2”输气管道项目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一事，德国国外交部部长马斯表示，美国政府宣布制裁欧洲企业的措施，是无视欧洲对能源来源和获得方式的自主决定权。德国明确反对域外制裁。欧洲能源政策应由欧洲制定。

-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德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万例，达200260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534例；新增死亡病例7例，累计死亡9078例。

7月20日 德国北威州通内斯肉联厂爆发新冠肺炎聚集性感染。多数东欧劳工没有签订直接雇佣合同，从而不能享受到等同于德国正式雇员的待遇。该厂宣布，将于9月前正式雇佣目前在工厂工作的1000名东欧合同工，并逐步为核心岗位的所有合同工提供直接雇佣合同。

7月21日 欧盟峰会就2021年至2027年长期预算及“恢复基金”方案达成一致，为疫情后欧洲经济复苏铺路。原定的7500亿欧元的经济复兴援助计划总额保持不变，但改变了无偿拨款和贷款的比例。先前计划中拟定的5000亿欧元无偿拨款改为了3900亿欧元，剩下的3600亿欧元则通过贷款实现。

7月22日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Foundation）发布的一项调研显示，在德国大约有280万儿童和青少年在贫困中成长，这一数据占有18岁以下青少年的21.3%。平均每七个孩子中，就有一人的生活依赖社会救济，占比大约为13.8%。

7月23日 德国市场研究机构捷孚凯公布的报告显示，8月德国消费者信心先行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升，为负0.3点，比7月调整后的终值上升9.1点。

7月24日 市场研究机构埃信华迈公司公布的月度调查显示，德国经济保持在复苏轨道，整体商业活动正在改善。德国7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上月的47.0升至55.5，为近两年来高点；服务业PMI从上月的47.3升至56.7，为过去两年半以来高点；制造业PMI从上月的45.2升至50.0，为过去19个月以来高点。

-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德国外长马斯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就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在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应加快相向而行，加大谈判力度，争取尽早达成一项全面、平衡、高水平的中欧投资协定

7月27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邀请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G7)峰会，德国外交部部长马斯持反对态度。他表示，目前没有把俄罗斯重新纳入七国集团的可能性，除非俄方“切实推动解决”克里米亚问题及乌克兰东部冲突。

7月29日 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近1.2万名美军，其中近6400名在德国的现役美军将被撤回美国国内，近5600名驻德美军将被转移至其他的北约国家境内。德国还计划将位于德国的美国欧洲司令部迁至比利时，同在德国的美国非洲司令部未来也将迁至别处。

7月30日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滑10.1%，创下自1970年有季度经济数据统计以来环比最大降幅。当季德国外贸进出口、家庭消费支出、机械和设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均大幅下降，政府支出在新冠疫情期间有所增加。

7月31日 德国外交部部长马斯宣布德国将暂停与香港特区的引渡条约。针对德国外长马斯发表涉港错误言论，中国驻德国使馆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表明了中方的立场。

7月31日 联邦劳工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的失业人数比上个月增加了5.7万人，与去年同比增加了63.5万人，失业率达到6.3%。为阻止失业率进一步暴增，大量企业采用短时工作制。目前，德国短时工作员工已达数百万人。失业救助金和短时工作津贴等社会保障支出也在不断增加。德国政府在维持社会福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8月1日 今日起，所有入境德国的人员都可在72小时内接受免费新冠检测。下周德国将开始强制要求来自风险地区的入境者参与新冠检测，在获得阴性检测结果前，必须进行隔离。德国政府最新确定了130个风险国家和地区，不包括中国。

● 一项名为“保障教育机会”的联邦计划于近日启动。该项“保障教育机会”将在2020和2021年为中小企业提供总计价值5亿欧元的培训资助。这项计划旨在保障年轻人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进而保障其未来职业发展。

8月7日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6月德国工业产出环比上升8.9%，但同比仍下滑11.7%。德国5月工业产出复苏趋势在6月得以延续。经工作日和季节调整后，德国今年6月商品出口额环比上升14.9%，商品进口额环比上升7%，但是同比分别减少9.4%和10%。数据还显示，当月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83亿欧元，同比上升15.4%；德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为97亿欧元，同比上升20.2%。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0年8月10日
<http://dgyj.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俞宙明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E-mail: dgyj@tongji.edu.cn